

论 文 提 要

我们党在执政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同人民群众关系的状况是不尽相同的。在执政之前（主要是二战以后），党群关系一直是很好的，的确做到了血肉般的联系。在执政以后，血肉般的党群关系却没有能够一贯到底，出现了时好时坏的情形。党群关系的状况如何，又总是和三个方面的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二）党的各级组织是否发挥了指挥部或战斗堡垒作用；（三）广大党员是否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这三方面的因素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得偏废。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建国初期，党群关系之所以那样密切，就在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发挥了应有作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群关系受到一定损害，主要是由于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出了偏差。“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群关系遭到严重破坏，则是因为我们犯了全局性的“左”倾错误，不但路线、方针、政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各级组织也失去领导作用，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一度时期中，使正在恢复和发展的血肉相联的党群关系又遭到严重的破坏，乃是由于我们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发生了失误，更由于我们淡化了党的领导，忽视了党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扭曲了组织路线，丧失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应有作用。因此，恢复、发展乃至在一定程度上重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极大地增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吸引力、凝聚力，就再一次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关乎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而提到了全党的面前。

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关于党群关系的历史考察

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这个文献，既是对我们党优良传统的科学总结，也是今后党风建设的指导纲领。它所揭示的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关系国家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正值我们党诞生70周年之际，也正值我们党和国家处在历史发展关键时期的今天，对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作一番历史考察，是很有意义的。

一

“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时代，是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历史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她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乃是这一历史时代开端的标志。在论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曾反复指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①由此，人们不能不提出：有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会发生根本变化，这到底是为什么？在中国近代史上，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也失败了，唯独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获得了成功，这究竟又是为什么？论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条是特别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建立的密切相联的血肉关系。稍微懂得中国近现代史常识的人们，都会熟悉“唤起民众”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最初是孙中山在他的遗嘱里提出来的。孙中山的本意是要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去“唤起民众”。但历史的回答，这是绝对办不到，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把它付诸实践，并且获得伟大成功的，最终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这是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几乎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的历史，就是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唤起民众”，人民群众无限热爱党，坚决跟党走，从而形成血肉相联的党群关系，其根本原由就在于：（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他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深知“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②。只有动员人民一致奋起，革命才能获得成功，否则，“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③。这是共产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坚持“唤起民众”闹革命的坚实的思想基础。（二）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共产党取得人民群众无限信赖，得到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人民群众的利益，决不是空洞的抽象概念，它是集中地、具体地体现在党的政治领导，即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面的。因之，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成为人民群众信任党、拥护党的基础，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紧密相联的血肉关系的基础。但是，要使这种血肉相联的关系真正变成现实，除了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外，还必须使人民群众也认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列宁说，只有“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党和人民群众才能水乳交融，形成休戚与共的血肉关系④。人民群众的“切身经验”，是从人民群众得到的切身利益中来的。所谓切身利益，归根到底是个物质利益。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最终就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物质利益，为人民群众谋取最大的物质福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⑤毛泽东甚至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⑥事情非常明白，在中国，谁能够解放社会的生产力，谁就必然取得人民群众的无限信赖，谁能够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谁就必然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中国人民之所以把共产党看作“大救星”，纵情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正是由于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建树了不朽的功勋，把中国人民引上了自由和幸福的光明大道。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心任务和目标，是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解放社会生产力。但是，在每一个革命历史时期，党既担当着实现中心目标的重任，又肩负着现实的政治任务；既代表着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又代表着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据此，党在领导每一次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始终把现实的政治斗争和中心目标，把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紧紧地抓着了三个关节，引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这三个关节是：（一）率领广大人民群众，向着共同的阶级敌人进行胜利的斗争；（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武装群众，启发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唤起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斗争；（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竭尽一切努力多给人民谋福利，并且与群众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对于这种情形，每一个亲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们，都是记忆犹新、引以为荣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的特定国情，也是我们党制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环绕武装斗争、服从武装斗争这个中心任务的前提下，我们党一贯非常注重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并且身体力行地和他们一起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事业。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支持了革命战争，改善了群众生活；而革命战争的胜利，群众生活的改善，又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从而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联的关系，一步步地加深和密切起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极其险恶的情势下，毛泽东仍然反复强调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对于进行革命战争，打破敌人“围剿”的重大意义，指示要把经济工作摆到应有的位置，发展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合作社和对外贸易，号召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成为群众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把广大人民群众吸引过来

了，调动起来了。这样，“我们领导广大的群众和红军，不但屡次击溃了敌人的‘围剿’，而且从事于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去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⑦。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侵略军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困难严重到了极点。党中央和毛泽东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确定为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在解放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而且，全党上下，保持爱护人民的共产党作风，坚决反对不顾人民死活的国民党作风，首先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群众解决“救民私粮”，然后，再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向人民征收“救国公粮”，确实做到了“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⑧。从而博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取得了经济建设的丰硕成果，使解放区军民渡过了极其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迎来了向日本帝国主义大举战略反攻的好形势。在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又把减租和生产当作粉碎国民党进攻、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我们在各个解放区普遍组织和建立起变工队、互助组和合作社，掀起了生产运动的新高潮。接着，党又在解放区发动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最终实现了农民的“耕者有其田”的长期宿愿。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的广大农民，以空前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劳动积极性，迅速地改变着解放区广大农村的经济面貌，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高兴地指出：“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⑨

由此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尽管在革命战争的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们党都始终不渝地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做人民所做，为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人民群众得到了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这不仅直接为巩固工农联盟，为实现和加强无产阶级对农民群众的领导，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而且更为重要、更为深刻的是，它最终使广大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确信了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确信了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唯一代表者。人民群众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党英勇卓绝、前仆后继的对敌斗争，通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通过党给他们谋得的现实的物质利益，看到了自己的根本利益之所在，看到了党的远大的政治目标，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灿烂前程，看到了我们祖国的光辉远景，从而以饱满的政治热忱，汇集到共产党的周围，成为党领导下的推翻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伟大力量。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联的关系，正是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发扬光大的。

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以崭新的姿态挺立在全世界面前，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新时代。胜利的无限喜悦和力量，极大地鼓舞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发努力与艰苦拼搏，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宏伟事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从来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的，也是世界上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这就为我国四个现代化

建设创造了必须的前进阵地，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一切否定这种成绩，或者低估这种成绩的观点，都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应有立场，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

但是，也应当看到，如果拿建国三十多年应该达到的目标来衡量，特别是拿社会主义这个优越的社会制度来要求，我们的成绩就显得很不够了，人民群众就不满意了。这就是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全国人民殷切期望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能够有个相应的大发展，人民群众的的生活能够得到不断的显著的改善。可是，我们并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地满足人民群众这个合理的要求，反而还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甚至是很大的困难。这就不能不成为血肉相联的党群关系遭到削弱甚至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形做一个历史的回顾，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血肉相联的党群关系的巩固与削弱、发展与损坏，总是和我们党的政治领导，和党的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或指导方针是否正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陈云尖锐指出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生活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在这里，陈云高度概括了我们经济工作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党只有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处理和解决好革命与建设、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才能实现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才能保证经济工作的顺利成功，才能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紧密相联的血肉关系；否则，党的政治领导就不可避免地要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冲突而导致削弱，经济工作就必然要遭受挫折，党群关系就一定要受到损害。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确也有过沉痛的教训。建国以后，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由于我们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正确，充分体现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妥善处理了革命与建设、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6%，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2.6%，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7%，职工工资平均每年增长5.5%。这样，我们党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取得了震撼全球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光辉胜利，顺利地解决了大量的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卓有成效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腐朽反动的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那些年，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比较充裕，社会安定，风气良好，广大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感到大有奔头，前途无量，打心眼里都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但在以后的某些时期，情况却发生了出乎人们预料的变化。

本来，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以后，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就应当及时地转移到旨在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来。事实上，在党的“八大”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正确路线。而且，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还继续发展了“八大”路线。如果按照“八大”路线搞下去，我们取得的成绩就要比已经取得的大得多。可是，我们不仅在执行“八大”路线中发生了严重偏差，而且也没有能够将“八大”路线贯彻到底。先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刚刚开了个好头之后，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

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而当觉察并纠正“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还未得到彻底纠正的时候，这种错误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接着，便开展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无情地打断了“八大”路线的贯彻执行。由于经济工作的“左”的指导思想的恶性膨胀，也由于政治上的严重的“左”的偏差，再加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的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使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进行，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因此，人民群众就大不高兴了，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那么“确信”了，致使血肉相联的党群关系遭到了严重的削弱甚至破坏。

列宁指出：“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领导一个大国（现在还没有得到更先进的国家的直接援助）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来说，最大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绝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⑩列宁的话，深刻揭示了党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极端重要性。由于越来越严重的“左”倾错误，使我们党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的确走了相当一段“脱离劳动大军”的“最危险”的路程，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然而，我们的党，不愧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党，代表人民利益的党，为人民群众造福的党。对于我们党为民谋利的高度责任心，陈云曾经讲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安排好全国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正是基于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的需要，所以在我们党发现自己脱离群众而犯了错误以后，就果断地作出正确决策，来挽回由于错误造成的重大损失，消除出现的经济危机，引导人民渡过困难。六十年代初中期所实行的经济调整，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全党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战胜了严重经济困难，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自1978年底开始，又从根本上彻底纠正“左”倾错误而实行的改革开放，党率领全国人民阔步前进，更赢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明媚春天。

三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拉开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帷幕。以“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意志。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经过十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改革开放的十年（1979—1988），同过去的二十五年（1953—

1978)相比较,我国的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由7.9%提高到11.3%,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由6%提高到9.3%,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由1.6%提高到6.5%。可以肯定地说,改革开放的十年,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生机最为旺盛、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

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起步的。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地改变了农村的经济面貌。从1978年到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由3047.5亿公斤增加到4073亿公斤,年均增长170亿公斤;棉花总产由216万吨增加到625万吨,增长近两倍。粮、棉单产分别提高了40%和100%。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贯彻实施,整个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经过十年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如果把这些变化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使我国原有的僵化、封闭的中央集中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具有活力的、开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转化。改革开放给整个国民经济注入的生机活力和带来的丰硕成果,全国人民是看得见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间,由于我们借鉴历史经验,严格遵循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注重实效、稳步前进的指导方针,开创了国民经济持续和健康发展的新局面,博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称赞。在农村,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完善及其所带来的物质方面的巨大变化,终于又使广大农民依据自己的“切身经验”确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了,终于又把当年土改和合作化所点燃的广大农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炽热感情重新焕发起来了。这表明,我们党在农民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党群之间血肉相联的关系开始恢复并发展了。我们党同八亿农民关系的改善和加强,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振奋人心的大事。

在城市,随着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执行,我们已开始走出一条以改变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为主要内容的发展工业生产力的新路子。按这条路子走,必将为我们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提供可靠的保证;必将打破重工业的“自我循环”状态,把轻工业从“自我奋斗”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达到扩大社会生产的目的;必将使我国的建设取得良好的经济效果,较快地增加社会财富,较多地给人民以实际的物质利益。可见,这是一条健全发展的道路,是强国富民的道路,是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道路。由经济调整所指示和开创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及其已经取得的显著成效,有力地促进着党群关系的改善与加强;而党群关系的改善与加强,又更加大大推动着经济调整的深入进行。这完全是合乎规律的发展。

可是,正当全国人民以更加高姿态,卓有成效地深入进行经济调整之际,也正值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刚刚出台,改革重点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又偏离了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注重实效、稳步前进的方针,从1984年第四季度起再度发生了经济过热的问题。由于经济过热,速度过高,最终导致了经济不稳定:重大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经济效益下降和通货膨胀。因而在经济调整刚刚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新的扭曲。1984年全国农业丰收后,对粮食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对农民的富裕程度估计过高,便忽视和削弱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放松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财政、投资、信贷、物资向工业和城市建设倾斜,致使工农业发

展的比例失调，1985年以后粮棉生产出现了连续徘徊的局面，工业发展远远超过了农业的承受能力。物价连年大幅度上涨，超过了公众所能承受的程度。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农民也因此大大抵消了粮食提价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以权谋私等腐败问题恶性膨胀，用公款旅游、建房盖屋、大吃大喝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发展到以权弄钱和以钱买权的“权钱交易”，使党的组织路线遭到践踏。二是经济秩序、尤其流通秩序严重混乱，“官倒”、“私倒”盛行，贪污行贿成风。三是收入分配不公。上述情形和问题，引起了社会上的普遍关注和群众的严重不满，使得刚刚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血肉相联的党群关系又遭到了严重的削弱甚至破坏。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建国以来仅有的政治风波，固然是极少数政治阴谋分子妄图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拙劣表演。但它的酿成，和利用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不能没有直接联系。“动乱、暴乱中有那么多人卷入，酿成大祸，造成重大损失，群众对腐败现象不满，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①

四

通过对党群关系的历史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在执政前（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历史阶段，同人民群众关系的状况是不尽相同的。在执政之前（主要是1927年到1949年的二十二年中），党群关系一直是很好的，的确做到了血肉般的联系。在执政以后，即建国以来，血肉般的党群关系却没有能够一贯到底，出现了时好时坏的情形。严酷的实践表明，党群关系的状况如何，又总是和三个方面的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二）党的各级组织（包括领导机关和基层组织）是否发挥了指挥部或战斗堡垒作用；（三）广大党员是否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这三方面的因素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离开其中的一个方面，党群关系都必然要遭到削弱和破坏。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建国初期，党群关系之所以那样密切，就在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发挥了应有作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群关系受到一定损害，主要是由于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出了偏差。“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群关系遭到严重破坏，则是因为我们犯了全局性的“左”倾错误，不但路线、方针、政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各级组织也失去领导作用，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致使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得以乘机混水摸鱼，窃取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权力。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一度时期中，使正在恢复发展的血肉相联的党群关系又遭到严重破坏，乃是由于我们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发生了失误，更由于我们淡化了党的领导，忽视了党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扭曲了组织路线，丧失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应有作用。因此，恢复、发展乃至在一定意义上重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极大地增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吸引力、凝聚力，就再一次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关乎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而提到了全党的面前。

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确定之后，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模范作用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确保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发挥应有的作用，一要在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下功夫，二要在经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

的考验上作文章。所谓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最根本的是一个把握国情的问題。建国以来,我们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几度发生失误,原因就在于脱离国情,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热衷于求成过急。因此,深入了解国情,认真研究国情,严格遵循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注重实效、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就成为端正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关键所在。要教育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牢固树立“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观念,在全党造成一个“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①②}的良好风气。所谓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实质上是一个苦与乐的考验。是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还是一味追求享乐腐化?在革命战争年代,主要是一个生与死的考验。那时候,贪图享乐无条件,想搞腐化不容易。为了生存,为了革命,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实实在在的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其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国以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现在又搞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物质享受有条件,贪图腐化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党员干部就只要做官,不要做事,把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抛置脑后,一心想着以权谋私,行欢作乐,把自己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成主人与公仆的关系,极大地败坏着党的声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党风问题。对党内存在的这种歪风邪气,如不及时荡涤,任其蔓延发展下去,我们的确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③。而要使这种危险成为不可能,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就必须把端正党风当作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永远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本色,永远保持清正廉洁和艰苦奋斗。对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许多革命老前辈都曾作出过坚定地回答。正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指导思想,我们党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吸取了痛切的教训,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老前辈关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谈吐中记取了深刻的教诲,在对亡党亡国的危险性作了清醒估计的基础上,把以改善与加强党群关系为中心内容的党的建设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一方面及时纠正了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号召与组织全党为进一步搞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而努力奋斗,以真正求得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定;另一方面又及时加强了党风建设,强调从领导做起,带头作出表率,要狠抓实事,不说空话,坚决惩治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并已开始取得成效。紧接着,又从确保党、国家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高度,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①②③⑤⑦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49、1060、612、980、116、849页。

④⑩《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82、589页。

⑥《毛泽东选集》1942年东北书店版,第876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1页。

⑪袁木:《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宣言》,1989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⑫⑬《陈云文选》(一九五六年—一九八五年)第35、245页。